



[heart]

NAVIGATION ON THE LAND

陆上行舟

文明的脉络迂回蜿蜒，引向交汇和碰撞。

百年来，西方来客的足迹逐渐在东方国度之中延伸，他们面对文化差异，最终化解和超越，构建了新的叙事。

他们的故事关乎在别处的他们，也关乎此处的我们。

SIDNEY DAVID GAMBLE 西德尼·甘博

尘封的底片 FILMS UNVEILED

撰文：刘小荻 编辑：陈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那些想要准确了解中国社会的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问号，而对于那些关注国家转型发展的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挑战。”

多年后，甘博回忆起前往中国的第一次旅行，他说：“就像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了一口，很难从这种叮咬中完全康复。”出生于1890年的西德尼·甘博 (Sidney D.Gamble)从小家境优渥，爷爷是宝洁公司创始人詹姆斯·甘布尔。18岁那年，甘博跟随父母开启了首次的中国之行。在此后的1908到1932年间，他先后四次远赴中国，对中国城镇和乡村进行了深入的社会经济调查，并且在1922年协助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17年，在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硕士学位后，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甘博的第二次中国之行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

他们进入四川腹地，在四川盆地东南的铜梁县，老街还铺着旧石板，骡子拉着货物走在石板路上蹄声哒哒。而汶川境内的瓦寺土司官寨，在这个始建于明代的城堡式村落的狭长豁口，甘博注意到入口台基上独特的瓦顶歇山木构建筑，建筑里铸有琼鸟，相传瓦寺民众是琼鸟卵生的后裔，民众视琼鸟为图腾，相信它能降妖除魔，护族人平安。寨里的土地庙仍留有木质的垂花门，小庙三面垒石，庙里的神龛仍然供着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塑像。甘博用手中相机记录下眼前的景象，那些打谷场里筛谷子的羌族人，手持转经筒的年轻喇嘛们，还有藏族民居上飘扬的经幡……继续向川西进发，在距离瓦寺土司官寨八十多公里的群山间，他们登上了盘踞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的杂谷脑镇山顶的古寺。清乾隆年间，由时任杂谷土司带领民众在寺内用了10年建成一座通体白色的“白塔”，而在甘博拍下恢弘白塔的十多年后，20世纪30年代，白塔毁于战火。

原本一行人准备前往更深的中国内陆，但因为西藏边境关闭未能成行。在4个多月间，他们走过6500多公里，途径了12个城市，拍摄了上千张照片。在结束那次旅程后，甘博决定留在中国，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北京中心创办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义务干事，对中国的都城北京，展开一项“未曾尝试的社会实践”。

20世纪初，蜂拥而至的探究目光涌向了这个古老神秘，却一度十分封闭的东方古国。甘博有着扎实的社会经济学的专业背景，这让他能够从更为科学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他看到和西方生活场景迥异的东方生活，并且试图去探究场景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意涵。同时，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甘博的相机为千百万中国社会里的普罗大众而停留。他的镜头是冷静的，却又充满了人文精神，客观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百相。这些照片最初只是甘博社会调查的补充，然而最终成为了极其珍贵的民族志。

甘博很快在中国找到可以协助他完成这份宏大社会调查计划的助手，他与《北京指南》的作者梁载治等人一起开始了对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年，调查结果《北京社会调查》出版。

北京的社会调查涉及的领域相当广博，包括政府组织架构、健康、人口、教育、商业、娱乐、慈善机构、监狱、社会工资、教会等等。甘博将调查的背景表述为：“当前的北京和中国存在着两项运动，一项是在知识阶层中开展的文化复兴运动，或称新思想运动，另一项是遍及各阶层的基督教运动。这两项运动都使人们对实际的社区服务事业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敏锐地提出预测：“新文化运动目前的一种危险，是过分强调西方的社会理论。”



甘博与《北京指南》的作者梁载治等人一起开始了对北京的社会调查，其中调研了北京人的文娱活动，包括听评书，去剧院看戏

甘博发现说书这种古老的娱乐项目在北京仍然很流行。除了听评书，北京人的文娱活动还包括去剧院，“北京有22家普通剧院和8家露天剧院，是北京最受欢迎的娱乐场所。最早开设于1912年的剧院每晚都挤满上千人”。此外，寺庙和节庆的活动也是普通人甚至许多富人的绝佳社交场所。“在那些节庆时，接头上的人们售卖各种商品——鸟、狗、金鱼、篮子、黄铜、发饰和古玩。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表演——拳击、摔跤、说书、杂技等等。市集非常吸引人，对他们来说，闲逛看看发生什么是有意义的”。

在社会经济调查中，甘博在居民收入上投注了相当多的关注，他来到街头，主动询问拉车的车夫、抬轿子的轿夫、街边店铺里打杂的小厮的生活和收入，他为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艰苦生活鸣不平，也相当细致地记录下了工作时间，“一周七天整天工作是整个中国的惯例。销售商品的工作从2到14小时，大多数商店5点或者6点停止营业”。

在甘博的镜头下，也记录了在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中的很多历史时刻。1918年，在观看一战停战的庆典仪式上，一个裹着尖尖小脚坐在铜鼎边休息、穿着罗缎的妇女吸引了甘博的目光。“一个富裕的贵族，北京没有真正的贫民窟，富人和穷人生活在同一个区域。”而在五四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中，和警察对峙的青年学生也停驻在甘博的底片上。“学生们不愿意离开监狱，和警察对峙，要求获得在街上游行和演讲的权力。”镜头同样转向北京的市井之间，甘博拍下了婚丧嫁娶的场景，留下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继1921年出版了《北京的社会调查》后，甘博继续在中国着手进行社会调查，在192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的研究著作。在中国期间，甘博一共完成了五部社会调查的作品，返回美国后，他继续在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直到去世。

英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曾说：“甘博是屈指可数的优秀摄影师，真正能够做到用相机捕捉瞬间即逝的人物表情、姿势和种种构图要素，它不仅使作品本身发扬光大，更代表了整个时代和文化。”

直到甘博逝世十多年后，在1984年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甘博长女凯瑟琳·甘博惊讶地发现会上展出的一张20世纪初拍摄于中国的风土照，竟然出自自己的父亲。为了探寻父亲留下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凯瑟琳和协会主席一起回到甘博旧居，推开了那扇阁楼的小门。

陈旧的木香从阁楼的角落腾散开来，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前那个平淡无奇的普通白日，18岁的甘博站在开往遥远东方的船只甲板上，人群在身后窃窃私语，他对即将开启的旅程几乎一无所知，只听到教堂的钟声远远敲响，一幅未知而迤迳的东方古国的图景在他头脑中悄然展开。



上：北京妙峰山庙会，山下的舞棍表演，1924年
下：北京妙峰山庙会，甘博拍摄的信徒，他身上背着马鞍，1924年



中国北京，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一位裹脚的上层女性在抽烟，1918年

RYUNOSUKE AKUTAGAWA 芥川龙之介

竹林之行 TRAVEL IN A BAMBOO GROVE

撰文:王扬 编辑:陈爽

东方,西方,新人,旧人,传统,现代。芥川的中国之行,恍如一座迷宫。

一 “我不禁怜悯起那些玫瑰花了。”

1921年3月21日下午,芥川龙之介登上前往上海的客轮,很快他便遭遇当头一棒。船一入海,大海就变得汹涌起来,转眼间已是白浪滔天,弄得众人头晕目眩。“我想到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渡海到英国去的途中遇到狂风暴雨。听说那次的经历,对他日后创作《彷徨的荷兰人》起了很大作用。头晕加剧,有点儿恶心,想吐。这些症状看来一时难以消失。最后终于觉得:什么瓦格纳,去你的吧!”

也许是晕船导致的身心俱疲,芥川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并不佳。“一脚刚跨出码头,我们就被几十个黄包车夫团团围住。”来自街头的盛情欢迎使芥川慌乱,而到了原本计划下榻的旅店,却又全不见预想中的地主之谊:“要我住在这家旅馆,似乎是大阪总社泽村君的主意。而这位身材彪悍的老板也许觉得,把房间借给芥川龙之介,万一被人暗杀,可就不偿失了吧。”这当然是玩笑话——这间旅馆名为“东亚洋行”,朝鲜政客金玉均的确在这里遭人暗杀,但距当时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大抵早已人非物亦非。然而遭遇店家冷眼,却又是事实。

芥川原本对这次中国之行满怀期待。此行由大阪每日新闻报社促成,报社出资,而芥川则要以“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撰写中国游记,交由报社连载刊发。在临行前,芥川致信大阪新闻报社编辑,同时也是前辈作家的薄田淳介(薄田泣菫),表示纵然中国早已不及昔日伟大,但此行的目的是“要找到如今中国的伟大之处”。可至少在上海的初印象令芥川失望。当他与友人闲逛,偶遇一在咖啡馆前卖花的老妪,一群英国水兵突然闯入,撞翻了老妪的花篮。可悲的是,当友人扔给老妪一枚银币,想以此补偿她的损失时,老妪却伸出手,继续向他们乞讨,任由玫瑰花遭人践踏。

“这个厚脸皮的老太婆以及白天乘坐的马车车夫,是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遗憾的是,它确实确实也是中国给我的最初印象。”

二 “种子已在手,只怕万里荒芜。”

行路中国之难——海上的颠簸、街头的不快遭遇——再加上临行前便微有抱恙,芥川很快病倒了。“第二天我就卧病在床,第三天住进了里见医生开的医院”。好在一众友人对他照顾有加,再加上有连载任务在身,住院三周有余,芥川便恢复了活动。4月20日,他给同样喜好漫游的作家好友小岛政二郎寄去明信片,“南京路相当于上海之银座大街。我所去咖啡店、书店等,皆在此处。中国新派女学生烫着刘海,围着羊毛披肩,其昂首阔步之奇观仅在此处可见。”

大正一时的日本文人,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多来自对其旧文化的“思乡”之情与浪漫想象。因而当他们踏足彼时之中国,往往会生出诸多不满。但独树一帜,期待在中国探寻其当时之伟大的芥川,倒是在中国的“新人”身上得到鼓舞。在上海,他曾与章太炎和郑孝胥见面,虽相谈甚欢,但多流于场面客套。然而唯有与李人杰的会面,令芥川由衷有所触动。“从信仰上来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是上海被国内外称之为‘Young China’的一员”。“Young China”是当时海外对中国积极吸纳新思想之新人的称呼。而芥川自己,当时亦是“新人”——《大阪每日新闻》当时给他的中国游记专栏取的名字即是“映在新人眼里的新中国”。于是两位新人,就现代中国之命运做了一番讨论:

李氏云,现代的中国该如何?要解决这一问题,既不在于共和,也不在于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之改造无能为力。过去业已证明之,现时仍在证明着。然而,吾人所该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之一途。此乃宣传文化运动的“年轻中国”思想家均在呼号之主张。



白云观的石碑,哈佛燕京图书馆(8001559900)

路途漫长而肉身沉重。芥川对李人杰印象极深,以至于不光在游记中为他单辟一章,还在写给泽村的信里继续感慨“李人杰堪称出类拔萃之才”。只是此时的芥川不会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他与李人杰——本名李汉俊——相见的这栋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宅,将会发生一件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大事。他更不会想到,他与自己年轻的中国朋友的生命,都只剩下六个春秋。

三 “在感叹先生之老之前,我首先赞美了我自身的幸福。”

芥川原本计划游历上海后径直前往北京,但由于病情拖累,只能以上海为落脚点,不时前往江南各地短途旅行。在杭州,西湖的庸俗化倾向令他大失所望。当他来到湖畔的大槐树下,神游于《水浒传》的世界中时,猛然发觉“走来的并非智多星吴用,而是臂上挽着大竹篮,缺乏诗意的糖果小贩。”而在苏州,当他穿行于竹林中遇见蝙蝠而心生厌恶时,却又不禁想到蝙蝠在中国乃是福兆,江户时期的日本亦是如此,“但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不知不觉之间,如盐酸似的把江户本来的面貌给腐蚀殆尽了。”只有在扬州,芥川才感到些许安心,“等到五亭桥以淡青色的天空为背景,从柳树丛中露出倩影时,我不由得微微一笑。西湖、虎丘、宝带桥——这些景致自然也不能说不好。但让我感到幸福的首先是扬州。”

是的,就连芥川也未能免俗:异域之眼所见的真正之美,实难逾越自身之乡愁。芥川当然不拒斥西洋文明,但当日本的东方风情因现代化的急速转型化作固然自由多彩但最终耽于无序怪诞的“大正浪漫”,他期待在中国——东方传统更深厚的中国——觅得朝向现代的不同进路;然而亲眼看到中国大城市也只能被动承受强劲西风的冲击与破坏,他也只能在尚且偏安的清幽扬州,找到些许慰藉。

所以到6月终于离开上海,北京成了他最后的希望所在。他在北京遍览名胜,“不仅有北海、万寿山,亦有天坛那般谁都要去看的地方,而且还有文天祥的祠堂,杨椒山的故居,以及白云观和永乐大钟(这大钟已一半埋在了土里,事实上正被用作公共厕所)”;听了京戏,“昨晚去三庆园听戏。归途经过前门,上弦月高挂,其景色令我穷于描述。”而最要紧的,或许是和辜鸿铭的会面。这位“东西南北人”见识过世界,然而最终还是蛰居东方。其高谈阔论令芥川深感钦佩,然而当他问及辜鸿铭缘何不出山时:

先生似有所恨地在粗纸上大书曰:“老、老、老、老、老……”……
将要走上大街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先生家的大门——心里思忖:请您幸勿怪罪。我在感叹先生之老之前,首先赞美了我自身的幸福,因为我至今仍年轻,而且有为。

东方,西方,新人,旧人,传统,现代。芥川的中国之行,恍如一座迷宫。好在就算找不到出口,这趟旅程也不会持续太久——毕竟报社经费有限。回到日本,芥川如约交付多篇中国游记,但真正能概括此次中国之行的,也许是在同年12月发表的名篇《竹林中》。在众人各说各话、各露心迹,唯独不见真相的叙述之后,死者说,“四下暝色已合”——无人得见来者为何。



ROBERT FORTUNE 罗伯特·福琼

慢船来采茶

SLOW BOAT TO TEA OF CHINA

撰文：明星辰 编辑：周亦鸣

在他的笔下，我们仿佛重新窥见历史长卷中烟波浩渺的中国曾经的面庞——静谧的江南水乡，繁华的通商口岸，夜晚上海城的守门人，宁波山上的古老寺庙，苏州城里的园林老人，古老中国在福琼的探索下，缓缓地揭开了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神秘面纱，展现出一派沧桑、浑然却无比丰富的面貌。

1843年的夏天，当英国人罗伯特·福琼乘着一艘大船从英吉利海峡出发驶向中国香港时，他还未曾意识到，这一次的出发开启了他近十年对于近代中国的深入探索。此后，他对于中国植物与茶叶的大批量盗取和移植，不仅改变了世界茶叶贸易格局的版图，也让他因“茶叶大盗”“植物猎人”的声名而争议不绝。

彼时，罗伯特·福琼还只是英国皇家园林协会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园艺师。他出生于苏格兰，是家中次子，父亲是一位农场园丁。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对于植物学倍感兴趣，从镇上的教区学校毕业后，他考取了园艺学从业资格证，继而从爱丁堡的植物园进入到英国皇家园林协会。凭借对植物种植的天赋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他赢得了一张去往中国的船票。

美国作家莎拉·罗斯在《茶叶大盗》一书中提到当时的背景，“1842年秋，中英两国和谈的消息传到了皇家园林协会的殿堂内，这为派遣一支考察队进入中国最深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此时，英国对植物原料的探索和开发拥有公认的优先权，罗伯特·福琼是获外交部许可在战争尾声时前往中国的第一人。”

这正是清政府与英国签定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第二年，古老的中国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后，以一种屈辱且被动的方式打开了国门。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有着神奇而不可抗拒的魔力，它的宫殿、土地、人民、奇妙习俗及广袤土地上孕育的丰富物产都吸引着西方人，让这群探险家前仆后继地涌向了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罗伯特·福琼便是其中一个。

在当时，沿海与内陆的陆地交通都不甚发达，水路几乎是他唯一的选择，福琼在中国的旅行几乎都伴随着船只。英语中有一个短语，“Slow boat to China”，本意是形容一件事漫长无比的过程，这个短语几乎就像他旅途的写照。乘着一艘慢船，他从香港去到厦门、南澳岛、台湾，再从舟山登陆去往宁波、上海，重返华南探访珠江、虎门……

他在各地寻找奇花异草，磕磕巴巴地学说中国话，拜访各地官员，结识各式人等，不仅要学会如何与城里的看门人、花店老板、乡绅富豪相处，还要和村里的农人、和尚、强盗等各种人打交道。

当这个样貌奇特、红发蓝眼的奇怪人物出现在中国乡村时，总会引起乡民的阵阵骚动，在罗伯特·福琼所记述的《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时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当我走进村子，全村所有能走动的包括猪啊、狗啊都出来了，为的是看看我这个伙计……”、“天热的时候，当我坐在大榕树的树荫下乘凉，全村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都聚拢在我身边，好奇而又不无害怕地看着我，似乎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上来的……”

一开始，在福琼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帝国主义者的傲慢视角和做派，被众村民围观时他会高人一等地认为“身后总有一大群保镖护卫”，坚信“欧洲移民的西式作风应该成为中国人效仿的对象”，认为中国人普遍性“具备骗人、说谎的习性”……某次他在搭船过程中，遇见不敢为其渡船的船夫，他鸣枪恐吓船夫，到岸后再为其留下过路费，认为自己“教育了这些落后的人民”。

随着在中国旅途的深入，他逐渐变得温和而谦逊，同时也愈发审慎地记录下这个古老国度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船过舟山时，风景如画的群岛风光令人心醉，“陆地上群山耸立，肥沃的山谷斜插入海，岛上则是连绵的群山、山谷、溪流”；而当旅程行进到珠江，沿江所停靠的众多船舶，上到俗称“花船”的华丽大船，下到剃头匠的小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上城市，“到了夜晚，灯笼点亮之后，无数艘装饰着华灯的船只在洋行附近的江面上往来行驶，狂热而间或又有些悲伤的中国乐曲声，嘈杂的锣鼓声，闭塞闷热的空气，古怪的民族——既乖张又自负，所有这些都将给游客带来永生难忘的印象……”

在他的笔下，我们仿佛重新窥见历史长卷中烟波浩渺的中国曾经的面庞——静谧的江南水乡，繁华的通商口岸，夜晚上海城的守门人，宁波山上的古老寺庙，苏州城里的园林老人，古老中国在福琼的探索下，缓缓地揭开了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神秘面纱，展现出一派沧桑、浑然却无比丰富的面貌。

除了璇旒风光外，福琼还记录下了那个时代中国所特有的城乡景观，江浙一带的典型农具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定海街头不甚流畅的英文杂货店招牌，苏州园林里花匠“矮化”植物的诀窍，上海赴宴时官宦人家后院精彩的京剧表演，广州花船上吊钟花、山茶花、木兰的渐次开放…….

但罗伯特·福琼并非来此游山玩水，他在中国最主要的任务可分为两个阶段，自1843年至1846年期间，他跨越各个通商口岸、深入中国内陆，通过寻找苗圃、探访官员园林宅邸、徒步山野等各种方式为英国皇家园林协会搜集各种珍奇的中国活体植物样本。



茶园和建筑，1885年·茶业摄影珍藏·贝克图书馆·哈佛商学院 (olvwork710919)

三年间，他从中国带回了大量植物，包括“迎春花、荷包牡丹、中国蒲葵、白紫藤、胸花梔子（中国梔子）、芫花（中国瑞香）、双黄茶玫瑰及中国柑橘……”（《茶叶大盗》），这些通过远洋航运带回去的植物或被栽植于英国各个植物园内、或作为珍奇物种成为英国女王生日献礼，其中一种黄色玫瑰还以福琼的名字命名成为一种新的品种。

1848年之后，他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各地收集茶叶种子，记录茶叶种植、采摘及生产的方法，雇佣中国制茶者，将种茶及制茶的技术移植到印度。这一举动直接改变了世界茶叶贸易的格局，让茶叶贸易重镇从中国内陆转移到了英国属地。据统计，1866年时英国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但到1903年比例上升到59%，而中国茶叶所占的比率则从之前的100%下降到了10%。

阅读罗伯特·福琼在中国的旅途并非总是愉悦的心情，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东方冒险传奇从一派和煦逐渐变得突兀、惊悚，当这个英国人脱下洋服，剃了光头，戴上了一条假辫子伪装是从中国南方来的“大人”四处收集茶苗时，他已不再是一开始那个试图用“辫子梗”逗乐中国乡民的友好异邦人，而成为只身闯入东方为英帝国打造茶叶霸业的“窃贼”。

抛开宏大的历史与国家主义的叙事，罗伯特·福琼的确以外来者的视角极为详细而客观地记录下了近代中国在颠沛发展之中的浮光掠影——水手出海前祭拜神灵的流程、民间墓葬的制式与风水讲究、闽江边梯田的灌溉方法、福州发达的银行业、上海郊外热闹的“赛神游行大会”……这是我们无法从历史教科书中了解的那个摇摇晃晃却也丰富慨然的古老中国，它静静地伫立在风起云涌的时潮中，等待着这位“茶叶大盗”从这里开始他的冒险。



左页:工人在茶园,1885年,茶业摄影珍藏,贝克图书馆,哈佛商学院 (olwork710898)
本页:中国茶叶工人,1885年,茶业摄影珍藏,贝克图书馆,哈佛商学院 (olwork710883)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赛珍珠

中国孤独 CHINA OF SOLITUDE

撰文：王扬 编辑：陈爽

这是一个关于灵魂的故事，它穿越光阴，抵达它的终点。

一 “我的现实世界是亚洲，确切来说是中国。”

1892年10月，四个月大的美国小女孩赛珍珠来到中国镇江。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多年后，已经成为作家的赛珍珠在《战斗天使》(Fighting Angel, 1936)一书中回忆了父母当时在中国的事业与生活：这是一个关于灵魂的故事，它穿越光阴，抵达它的终点。对于这个灵魂而言，其命运是注定的，它对此负有责任，它践行了自己的责任，最终上了天堂——这便是故事的全部。……这个故事里没有平凡的生活，没有快乐的盛宴，没有欢愉的喜悦，没有死亡的传说；没有帝国、帝王、革命，也没有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动荡不安；没有对于人心不古的痛心疾首，也没有任何充满智慧的中国哲理。这个故事就像日升日落一般简单。

她的父母隶属长老会南会，他们将人的生活视为一场战斗，而这场战斗的最终目的是履行人预定之命运，宣扬上帝的荣耀。在赛珍珠之前，她的母亲卡洛琳已经在中国生了三个孩子，结果全部因为当时无法防治的“热病”早夭。这场战斗显然已经容不下更多悲伤，于是卡洛琳暂得喘息，回国疗养。在这两年假期的最后一个月，赛珍珠出生了——她的母亲只因此多休息了三个月，便带着她匆匆回到中国。

对于还是孩子的赛珍珠而言，战斗是大人的事。小赛珍珠并没有太多自己的忧愁——大人们把她的出生地描绘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天堂国家，而眼下的现实还只是孩童的游戏，“我们那时玩的游戏里，有人扮演世界警察和强盗；中国人和所有善良的亚洲同盟军与西方帝国列强打仗……作为唯一的美国人，我的职责是在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站出来，给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提供食物等援助。你看，半个世纪以前一群亚洲孩子玩的游戏，以后却成了现实”。

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小赛珍珠难免过早瞥见现实的阴影。她很快明白，梦中的美国背后，是父亲的四个兄长在不结束的南北战争中为南方而战，最终的惨败让他们原本属于弗吉尼亚的祖宅被划入政见相左的西弗吉尼亚——背井离乡投入异国的战斗，多少是为了逃离故国的耻辱；而在现实的中国，则充斥着莫名其妙但又似乎理所应当的、他者的痛苦。小赛珍珠有一位中国姐姐，是卡洛琳在当地大户人家收养的女孩。女孩的母亲在自己弥留之际将女孩托付给卡洛琳，她担心自己走后，孩子会被丈夫的小老婆虐待。卡洛琳尽心抚养这个女孩，后来在教会找到一位思想进步的中国青年做她的如意郎君。可传统的阴影依然不愿放过中国女孩——她一连生了三个女孩，因此饱受非议。而他的丈夫，一个“好基督徒”，所能做的也只是“宽容大度”。

“我们一家都太幽默，看不到事情的荒唐处，但却十分清楚事情的严重性。”这就是小赛珍珠的现实世界，而这将决定她一生的轨迹。

二 “所有外国人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混在一起了。”

“1900年，我八岁了，我的两个童年世界之间终于出现了裂痕。”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那年的春天仍是美丽的，可就连小赛珍珠也感受到气氛的异样。虽然母亲向她保证，我们美国人没有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但他们家的客人明显减少了，开始有中国孩子喊她“小洋鬼子”了。

真正的威胁在夏天到来。山东传来消息，一些传教士全家被杀，就连孩子也未能幸免。母亲慌了，父亲也坐不住了。先前他一直坚信不会有中国人伤害他们，所谓拳乱只是不足畏的插曲。然而“西方列强的欲壑难填”这次真的激怒了中国人，全国上下都已失控。



1937年拍摄的《大地》电影剧照，改编自赛珍珠的同名小说，讲述了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生活

“在那个晴朗宜人的夏日，我们乘船前往上海。”父亲坚持要留在镇江，于是把一家人安顿好便匆匆离去。镇江的家里，一切并未变化。母亲在临行前把家里的贵重银器埋在墙角，就像南北战争时她家里人做的那样。“现在我才意识到，父母之所以能在危险面前从容不迫，是因为他们在小时候就经受了炮火洗礼。”而说到底，战争与战争、混乱与混乱，对于卷入其中的落叶而言，并无根本不同。

无论它们颜色如何。

三 “我终不能信，我会一去不复返。”

赛珍珠只在上海居住了几个月，1901年返回美国。对出生四个月便离开美国的赛珍珠而言，故国反倒如同异乡。于是当麦金利总统遇刺的消息传来，众人只是感到悲伤，唯有赛珍珠惊慌失措，嚎啕大哭——这个小姑娘在中国生活太久了，还不知道美国总统并非“天子”，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她的中国故事还将继续。1902年，她又被父母带回中国，直到1911年返美就读大学。她于1914年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然后自己回到中国——这一次，她在中国生活了20年。

于是四十岁之前的赛珍珠，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1917年，赛珍珠与一位同样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的农业经济学家结婚，二人搬到安徽宿州，而这里也成了赛珍珠日后最负盛名的“中国三部曲”前两部（《大地》《儿子们》）的主舞台；1920年到1933年，他们生活在南京，随着时局越发动荡，赛珍珠的信念反倒坚定起来。她从1927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写作当中，决心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描述她所生活的中国——一个独具魅力的国度，但与其他地方并无根本不同。这里的人们与世上所有人一样劳作、收获，经历着平凡的喜悦与悲怆。他们本该拥有更多幸福。

1934年，回到美国的赛珍珠受邀在长老会妇女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海外传教士是否有必要存在”，而她的答案是“没有”。“我乐意跟中国人分享我的信仰，然而中国并不需要一个由外国人主导的机构。他们有自己的现实，而外国人往往只会视而不见。”不出意外，赛珍珠失去了在长老会的职务，而这样的戏码，日后还会在她试图为两个世界建立联系时反复上演。

赛珍珠终究看到了中国的孤独，并努力让更多人看到。如宿命一般，她同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就像日升日落一般简单”，结果几乎是最不重要的。还是在——这场聚会上——这次是出版商为《大地》组织的酒会——赛珍珠借施耐庵为《水浒传》所作之序（实为金圣叹伪撰）的结尾作为祝酒词：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1973年，耄耋之年的赛珍珠希望再次回到中国，未果。

但她并不眷念自己的孤独。

ERNST BOERSCHMANN 恩斯特·柏石曼

行迹圣山中 PICTURESQUE CHINA

编辑：陈爽

“这些建筑本身既是整个世界体系，又是精神体系的缩影。”

恩斯特·柏石曼在《中国宝塔》中写道：“这些建筑本身既是整个世界体系，又是精神体系的缩影。”

恩斯特·柏石曼在《中国宝塔》中写道：“这些建筑本身既是整个世界体系，又是精神体系的缩影。”

“出于对土地的亲近，中国人把土地看作他们力量和精神的源泉，他们把眼光转向土地最初始的状态——山峰。因此，他们探寻自身的存在，寻找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源，并在群山中探索神性的所在。”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写道。

当29岁的柏石曼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就迷上了这里的群山与寺庙。“在(北京)周边的群山里，有很多富丽堂皇的庙宇，西山最为著名，其中碧云寺是最为壮观的。”他在书中记录到，“碧云寺有一道道门，一进又一进的院落，还有大量的东西对称的建筑。”他站在碧云寺的制高点上，视线穿过葱葱郁郁的森林，看到远处的皇宫，“塔楼和宫殿直上云霄，这些绿的、黄的、蓝的琉璃瓦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反射到这里的寺庙和宝塔上，然后再把圣洁的光芒带回北京城内。”

这是柏石曼的第一次中国行，他访问了天津、北京和青岛等地，“拾掇了一些零散即逝的东方印象”。这其中，中国的传统建筑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在京期间，他对碧云寺进行了完整的测绘，随后萌生了系统考察中国古建筑的设想。

回国之后，柏石曼向德意志帝国议会提出申请，制定一个全面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考察计划。在给议会的备忘录中，他提及这项计划对于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那些古物，可能会在这样的灾难中逐渐衰亡，但是至少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文字和图像的记载。中国建筑文物很快会消亡，我在第一卷(普陀山)导言中曾表达过这种忧虑，很痛心被证明了。鉴于这一考虑，对中国古建筑文物尽快全面地录入登记，势在必行。”

他从政府申请到一笔专项研究资金，在1906-1909年间，再次以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官方科学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从北京出发，游历了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十几个省，行程数万里，拍下数千张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民居照片。他考察过的具有现代性的古建筑群落，包括承德外八庙、泰山岱庙、曲阜孔庙、太原晋祠、普陀山和五台山的寺庙，还有各地的文庙、东岳庙、土地庙等。

他希望尽可能精准地对建筑物进行测绘，绘制几何图形，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图片拍摄。“根据我个人实地的信息采集进行精确的、几何的测绘图绘制，通过绘画速写、照片和中国原始材料来进行说明。”他注意到中国建筑物上、寺庙中的文字，他将这些文字都记录下来，作为补充。

“在中国，圣山的理念来源于宗教和土地的关系。天下被五座圣山按照方位分割，在南北东西中各有一座圣山……圣山观念能最大程度地表达中国人的想法：内心和自然融为一体。”

前后两次中国之行，他追寻着一座又一座的圣山，捕捉建筑的巍峨映像。在峨眉山山顶，他与僧人们共处，看他们每日敬香、诵经、与神交流，“人们感觉与神只有一步之遥”。在东岳泰山，沿着天梯，他抵达了南天门。在最高峰的玉皇庙，他看到云雾缭绕，好似看见“人类的灵魂”。他感到从尘世中超脱，找到了道家描述的“仙境圣地”。



在山与山的路径里，在庙与庙的落点中，他绘制出一份蕴含中国精神的地理地图：“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我研究中国的主旨：理解中国文化何以呈现为今天所见的整体性，以及她内在蕴含的精神力量。因此，需要去探究重要文化遗址中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聚焦精神文化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地区，就像在我们文化领域中进行的研究一样。”

回国之后，他拟下一份写作计划，决定以“中国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为总题，将中国建筑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类别进行阐述。1911年和1914年，相继出版了《普陀山》和《祠堂》。前者聚焦普陀山的佛寺，后者对中国历史上纪念性的庙堂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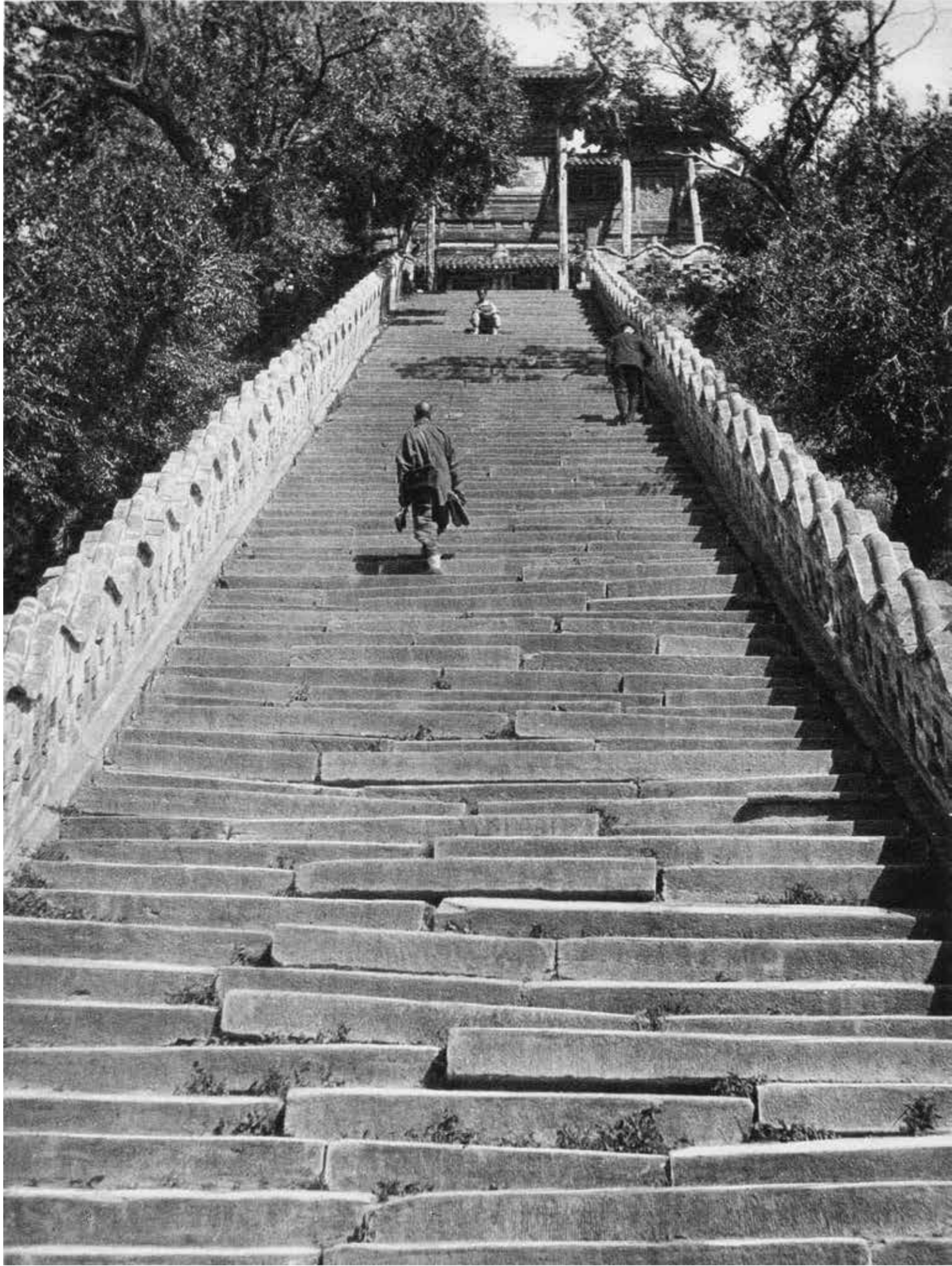
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祠堂》出版后不久，一战爆发，他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柏石曼弃笔从戎，并在战后负责东德普鲁士战争墓地的拆迁工作。但中国大地上“精神归宿”给予他的震撼始终萦绕在心，1923年，他终于得以静心来，重新书写并整理出288幅照片，集结为《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出版。

在柏石曼拍摄的288张照片里，有42处是现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约80处是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至少60处荡然无存。正如他在《中国建筑与景观》这本书的开头写道：“今天是向前流动的，明天隐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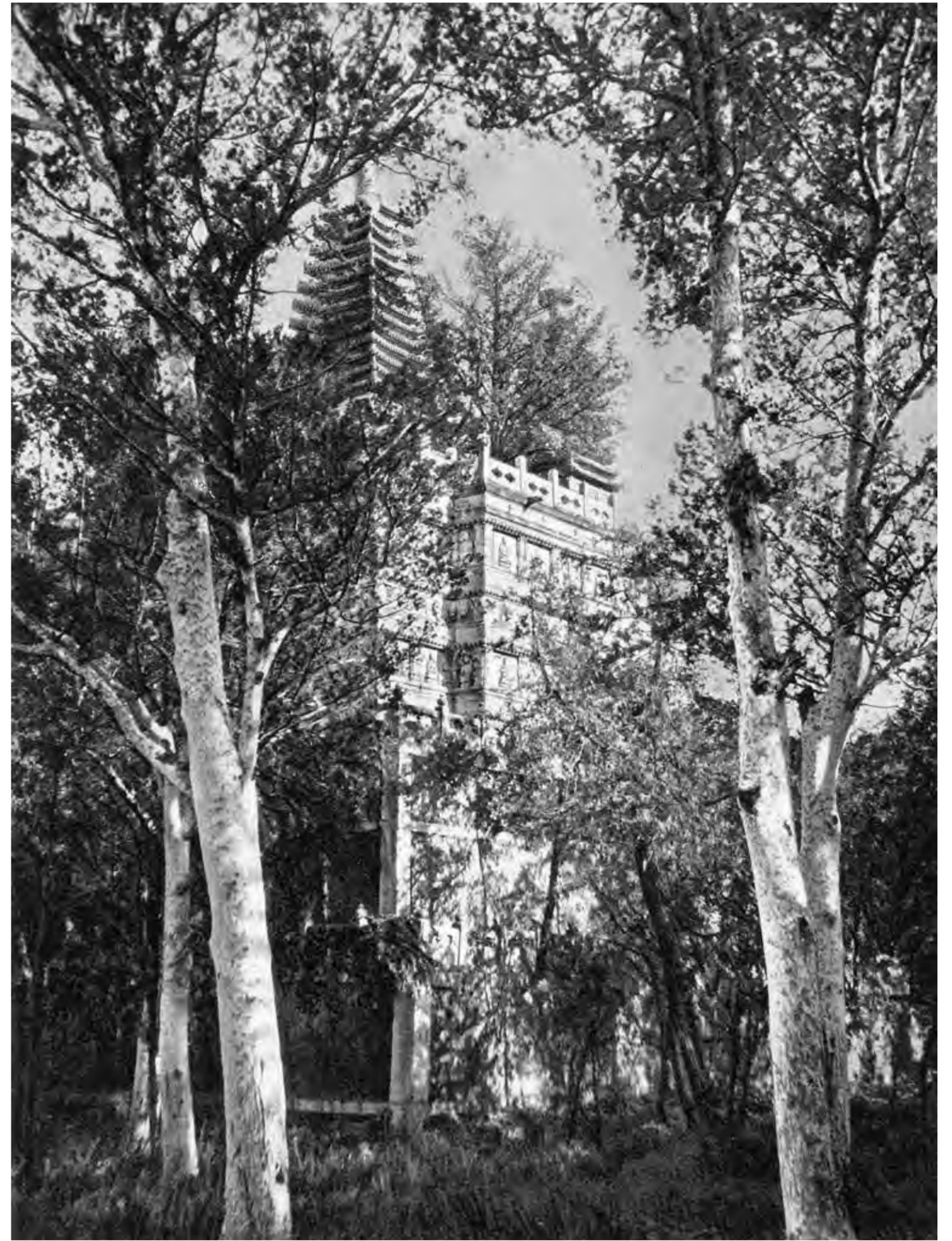
1931年，经艺术史学者艾湾风介绍，柏石曼第三次来到中国，与时任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取得联系。次年，他正式成为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但梁启超当时对柏石曼的著述似乎并不认可：“他们都不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指柏石曼和喜仁龙)对中国建筑的描述都是一知半解。”

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袭。1935年，他再次中断自己在中国的调研计划，回到德国继续创作《中国宝塔》。

至62岁那年离开中国，柏石曼大概已了无遗憾。就像他写的：“这个民族真正的内核仍会被继承并且会被永远保存下来。”而他也在中国之行中找到灵魂的平静：“这些与灵魂产生共鸣的感觉从哪里来……因为我们不仅为看到众多建筑和地面与周围环境和自然的统一，以及自己成为建筑与风景这个画面中的一部分而感到愉悦，而且我们还感觉到那些建筑本身，不，甚至连同它们的装饰物，都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一种鲜活的灵魂，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造成一种完全超脱淡泊的氛围。”



五台山菩萨顶·寺院入口·1926年



北京西山·碧云寺·1926年

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 约瑟夫·洛克

猎人的纳西之爱

LOVE FOR NAXI

撰文：汉时见 编辑：周亦鸣

在来华者中，植物猎人是支不容忽视的群体。约瑟夫·洛克就是位植物猎人，他花了20余年为各方机构制作了大量奇花异果的种子标本，他是唯一一位长久活跃在丽江及川甘一带的植物猎人。而除此之外，洛克出于其博物学、语言学兴趣，记录了纳西风貌与典仪的影像资料，并由于其专注与执着，赎买并保存了众多纳西文献，很多已是孤本。除此之外，由于研究兴趣，以及申请资助的需要，洛克完成了《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两部纳西实录，这为1959年后蓬勃的纳西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约瑟夫·洛克天亮之前就起床，他叫醒厨子，趁胃口好，吃下一顿丰盛的早餐，但要等探险队的成员从大麻和赌博的昏梦中醒来才能动身出发。洛克跃马挺进，随着行程的深入，洛克逐渐熟悉了西南地区的地理、植被，他心中勾勒的纳西人形象也一点点清晰起来。

这是洛克自己定义的“探险队”典型的一天。约瑟夫·洛克是半路出家的植物学家，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被抛掷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藏汉接驳地带丽江，他在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派遣下（偶尔没有任何机构派遣，有时有多家机构派遣，间或还有公司聘请他）开启了自己的漫游和探险。1922年2月11日，洛克告别在夏威夷的学术生涯，从缅甸入境，并获得国民政府发给洛克的“骆美国农林部专员”头衔的通行令旗。两三月后，洛克抵达大理与丽江，他将在这里开展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他的探险队包括他的助手、挑夫骡夫、士兵、向导、厨子，以及马和牦牛。他们会根据洛克的喜好，以及时机与需要，流变和重整。

洛克的探险刚好介于《国家地理》编辑马克·詹金斯（Mark Collins Jenkins）所命名的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时期（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尾声。像第一次地理大发现一样，第二次与海外殖民扩张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正是在如此激越的时空下，洛克时而被称作“白求恩”，时而被称作“特务”。

他对中国的兴趣也由来已久。1884年，约瑟夫·洛克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曾服侍过波托茨基伯爵（Jan Potocki），后者写有《萨拉戈萨手稿》（Manuscrit trouvé à Saragosse）。1897年，13岁的洛克开始学习汉语，并对遥远的中国产生神秘的向往。在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The Ancient Nax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序言中，洛克表达了对中文、纳西文的偏爱，是如何与探险结合在一起的。

初到丽江，洛克为这里的肮脏、贫穷感到困惑。在他心里，丽江应当有温暖潮湿的气候，以及富裕发达的商贸。可是，眼下这个仅有零星小商小贩的冷清城市令他低落极了，只有远处的雪峰令他心生神往。今天的丽江被称作“香格里拉”，延续着《消失的地平线》虚构的人间天国的圣景，这是洛克率先建构的，他将丽江一分为二，命名为东香格里拉和西香格里拉。

丽江的纳西人原是羌族的后裔。元代及之后，纳西人逐渐被一整套统治和管理体系汉化。洛克收藏的《木氏宦谱（甲）》记载了“元跨革囊”之外的一个传说：纳西的祖先是忽必烈的私生子，被赐名为纳西亲王，而从“爷爷”数起，《木氏宦谱（甲）》的原主人木公是第14代。后来，洛克在他的论文和文章里时常将纳西人浪漫化，称其为“纯朴的自然之子”“高贵的野蛮人”。

1923年初，洛克第一次体验到了信仰苯教、萨满教的纳西人所办一场驱恶鬼的宗教仪式。在雪嵩村一户生病太太的家里，众人用松树枝、麦子、面粉偶像将庭院改造成一座花园，三位东巴穿上鲜艳、符号化的服装，跳起了鬼魅般的舞蹈。洛克起初并未被此吸引，他给生病太太把了把脉，喂她吃了一剂蓖麻油，说表演不过是巫术而已。但事后，洛克注意到了，这些宗教仪式底下埋藏着纳西的文化与语言处境。

1926年侯家寺跳神时，洛克已接受了这些宗教仪式。现场有20余人被鬼神附身，但洛克并未对此有过分的立场态度，他反而产生了一股积极的情绪，“我肯定还会受制于那种无形的外力，不管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突然之间，我的意志和控制力彻底离我远去……”

从1922年到1949年，洛克在西南地区的探险与游历非常之多。其中最经典的是一段名为洛克之路的探险。洛克从甘川接驳地扎古录出发，若向东，经博峪沟、扎伊克嘎、古麻山等地，以卓尼县为终点；若向西向南，经贡巴寺等地，以扎尕那为终点。洛克所经行处，今天被命名为车巴沟景区。

车巴沟最著名的地点是卓尼。洛克曾为《国家地理》杂志供稿，最早几篇文章都是关于他在卓尼的旅居经历。卓尼最盛大的节日是酥油花灯节，为了迎接酥油花灯节，喇嘛们会用色彩鲜艳的酥油塑成巨大的佛像。洛克为人群和他们的奋力所感动，撰写了酥油花灯节的文章，附带16张彩色照片，经由编辑大量删改发表于《国家地理》杂志。

洛克的摄影术有相当的考究，并不逊色于2010年代颇为流行的民族志摄影。他的构图中中规中矩。但可以想象，洛克颇能调动镜头前的人，使其摆出适宜的姿势，做出舒适的表情。洛克镜头里的人们展现了富有乐感的平静，他们被摄像机略微震撼，以辽远地探看和凝视，表达对某种异域文明的惊奇。那些风景远没有地景摄影师运作得那么奇观。姿势、服装、居所、仪式、集会、刑罚，在平静的表面上呼之欲出，其地其人的生活、梦想、美丽，并没有由于“入侵”行为而受到不可忍受的扭曲。



洛克家附近的纳西人仪式，哈佛燕京图书馆（olwork123758）

在来华者中，植物猎人是支不容忽视的群体。约瑟夫·洛克就是位植物猎人，他花了20余年为各方机构制作了大量奇花异果的种子标本，他是唯一一位长久活跃在丽江及川甘一带的植物猎人。而除此之外，洛克出于其博物学、语言学兴趣，记录了纳西风貌与典仪的影像资料，并由于其专注与执着，赎买并保存了众多纳西文献，很多已是孤本。除此之外，由于研究兴趣，以及申请资助的需要，洛克完成了《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两部纳西实录，这为1959年后蓬勃的纳西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7年日本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洛克异常地拒绝撤离，此举令美国驻云南领事馆的官员恼火极了。当大半中国被占领，国民政府栖居重庆时，待在丽江的洛克似乎全然免于战事。他守在丽江，照常向东巴请教，整理标本、填写清单、打包邮寄、处理账目。据斯蒂芬妮·萨顿分析，洛克能够把个人的痛苦和外界的事件分开来看待，即使在心情最为沮丧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

1949年丽江解放，东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洛克的翻译、助手也陆续离开了他。洛克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纳西，此前短短几年，他经历了疾病、通货膨胀，以及几番政府倒台。在布满道道深沟的机场，洛克顺利升空，永远地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他最重要的著作《纳西—英语百科词典》（A 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在他逝世后才得以面世。



丽江雪山下佩剑、穿传统战士铠甲的纳西人·哈佛燕京图书馆 (olwork123769)



在洛克家的庭院中举行的纳西族仪式·哈佛燕京图书馆 (olwork123761)

ANTONIA FINNANE 安东篱

运河之上，历史的余光 OVER RIVERSIDE

采访/撰文：周亦鸣

彼时彼刻，这位未来的汉学家不曾料想，这座萦回着诗篇、战争、想象和权势的富庶古都，即将是她盘桓了二十多年的研究主题。她一边亲身体验，流连于历史遗迹，感受这座城市河网纵横间的丰饶和开阔，也一边埋首故纸，聚焦于地图和文字记载，在扬州所铺展开来的史学问题当中不辍探索。

安东篱 (Antonia Finnane) 首次访问扬州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该市封闭多年后第一次对外国游客重新开放不久。在她眼中，这是一座安静的城市，灰蒙蒙的，满是尘土，但很迷人。城东小巷中的那些小瓦房，看上去似乎已经矗立了好几个世纪，或许情况确实如此。小贩们在街头出售各种食物。那些更宏伟的建筑虽已荒废，但依然暗示着遥远过去的辉煌岁月。一路上，主要的困难在于，她总是被当做老外，这种感受不仅在于语言的隔阂。

中国的新年正在临近，游客们正在城外湖边陈旧的亭台楼阁前闲逛。他们正踏着前辈游人的足迹而行。正如她将要发现的，在18世纪后半期，扬州以活跃的旅游业而自豪，并且在其财富源泉耗尽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继续吸引着许多游客。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并未得到有力的促进。当时该市最新的旅游指南出版于1954年。

彼时彼刻，这位未来的汉学家不曾料想，这座萦回着诗篇、战争、想象和权势的富庶古都，即将是她盘桓了二十多年的研究主题。她一边亲身体验，流连于历史遗迹，感受这座城市河网纵横间的丰饶和开阔，也一边埋首故纸，聚焦于地图和文字记载，在扬州所铺展开来的史学问题当中不辍探索。《说扬州》就是她研究的成果。

从现场到故纸，她打开了扬州的多个面向，让我们既从城市看到了个体微观的生活，也看到了国家的命运沉浮。

这座在唐朝被吟诵的城市，因孟浩然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而名垂千古，这是第一个黄金时代。16-19世纪的明清时期是扬州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是《说扬州》的论述重点。唐代扬州的诗歌和清代扬州的绘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持续流传，使这座城市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参照点。与威尼斯一样，扬州使人想起许多艺术家、文人、富商巨贾及水道的形象。这是一种非常迷人的城市环境，一段充满色彩和浪漫的过去。在最繁荣的18世纪，扬州是一座富有、美丽并且具有历史影响的城市，被运河包围和分割。

安东篱以绵密扎实的史实中铺开扬州在18世纪的画卷，这个汇集八方来客的口岸展示其迷人的富庶。1841年阴历五月，周生从长江南岸的镇江乘坐客船前往扬州，根据他的见闻，这支队伍有着形形色色的人，他简洁地捕捉到了清代扬州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面上的扬州社会的特征：塾师、有抱负的儒生、和尚、高利贷者、贩夫、衙役，他们同类相聚，都挤在一条来往于扬州的船上，由此勉强维持生活，或者是去把握最大的获利机会。妇女显然不在船上，但并没有脱离观察者的视野。一名乘客开始说话了：“诸君亦知扬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与苏小、葛嫩若何？”

安东篱提到，女性在扬州也是一道特殊的景观。繁荣的娱乐业培养了大量娼妓，服务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纺织业也容纳了大量纺织女工，使得女性在扬州有着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性。

展现形形色色当地人的面貌，也是安东篱所认为的自己所贡献的全新叙事，不像大多数学者只关注精英，诸如商人、艺术家和官员。她揭示了当地人和外来者、穷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以此来破解作为刻板印象的“扬州梦”。在千百年来流传的诗篇所构建的浪漫画面背后，是不同人被挤压的真实生存处境。诸如在瘦西湖边成就了美丽园林的盐商需要应对清政府的反复无常，背后是制盐工人在河滩边奴隶一般的劳作。



扬州瘦西湖，哈佛燕京图书馆 (8001623265)

从元明时期迁都北京起，大运河作为地区间的交通贸易线路变得尤为重要，往来于运河之间的盐商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重要杠杆，激发着这里的资源和活力。盐商当中有一部分是远道而来的徽商，他们离开故乡苛捐杂税繁重的农业，转向盐业贸易，成为扎根于此的重要社群。他们建立的商业、书院和慈善机构，带动了经济、培育了人才，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随着城墙的扩大，他们定居下来，也促进了风月场所的繁荣。扬州甚至可以说是成为了一座徽州城市。

这导致的现象在于，扬州商人和士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盐商家族变得士绅化，盐商园林和士人园林之间的区别也是模糊的。扬州的园林传统是苏州（明代士人园林的重要发展中心）园林传统的延续，如果说这种传统清楚地体现为夸张的假山等寻常特征的话，那么它也清楚地体现为苏州人计成所设计的园林之优雅。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士大夫郑元勋支持文人路线。他这样写道：“（园）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郑元勋扮演的园主、赞助人、士人和慈善家角色，为此后的扬州徽籍代表人物所继承。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都拥有园林和功名，支持文学和艺术，也因为赞助公益事业而著名。

10—18世纪扬州城墙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这座城市后来的兴衰命运。因其地理位置，扬州在战争中成为要塞，其破和守留下了一些英烈的慷慨叙事，诸如誓死抗清的史可法，也因此，扬州素有遗民传统，体现在诗篇和绘画之中。扬州为遗民学者和清朝士大夫提供了一个汇合之处，新秩序是旧秩序的延续。这既是他们得以见面的一个地方，也是在知识共同体和共同情感的表达基础上激起回应和反思的所在。

在安东篱对于扬州山水的描述之中，可见她徜徉其间的身影，也由此，她遁入那个欣欣向荣的过去。“在扬州，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是乘坐画舫前往城外的保障湖——后来它被称为瘦西湖。在18世纪，这种大众休闲活动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生意。画舫的规模和设计各式各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精致，因为添加了餐饮设备。最普通的画舫仅由盐船改造而成，即将从泰州买来的‘退役’盐船改装成客舟。”

画舫载着观光者沿着运河前进，从天宁门往西拐，划着或撑着来到瘦西湖的门户——红桥。这里原有一家酒肆，1757年皇帝巡游时变成一座官园，原先的产业经过收缩，酒肆得以保留下来。它昼夜营业，白天挂着帘子作为招牌，晚上挂着灯笼，出售绍兴和扬州各县出产的各种酒。画舫出红桥即进入瘦西湖，穿过各处水湾，绕着各个小岛蜿蜒而行。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茶馆和酒肆。挹爽酒肆在莲性寺后面一片偏僻的松林开张以后，成为一个流行的去处。由于“野食”顾客的增多，城墙外也开起了餐馆：韩园、留步、郭汉章馆、苏式小饮、流觞，还有其他餐馆。

跟随安东篱关于扬州的诉说，那个温柔乡的传说既属于过去，也绵延在当下，永久映照着历史的余光。

MICHAEL MEYER 梅英东

旧逝与新覆 THE PAST REPLACED

撰文：依蔓 编辑：周亦鸣 图片提供：上海译文出版社《东北游记》

梅英东1997年离开内江来到北京，一住就是10年。他在那里遇到后来的太太弗朗西斯。2010年，梅英东又在一个名为荒地的东北村庄——弗朗西斯的家乡，居住了一年。十几年的中国生活浓缩于梅英东的三部非虚构作品，《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失的老街生活》《东北游记》《中国变奏曲：一个旅行作家的中国二十年》。

2005年住进杨梅竹斜街后不久，梅英东成为离家不远的炭儿胡同小学的第一位外教。“梅老师”的身份让他更容易被邻居接受。

于是在《再会，老北京》中，我们得以认识一部分即将被“新北京”抹去的“老北京”——非要把香葱猪肉饺子递到你手里看你吃完的老寡妇，对英文脏话求知若渴的社区警察，拒绝搬迁与开发商博弈的老张，在屋顶养鸽子的小刘爸爸，亲眼看着工人拆除童年的家的朱老师。以及他们居于其中的、历经数朝更迭仍保持炽热生命力的社区。《再会，老北京》让许多中国读者第一次认识梅英东，也许也是第一次认识真正的北京胡同。

起初，美国人迈克尔·麦尔不想要“梅英东”这个名字。

但中文老师认为他的本名Meyer读起来像“卖儿”，容易引发穷困生活的联想，不合适。正如他所在的“和平队”也因名字可能引起误会，改为“中美友好志愿者”。“英东”二字与香港富豪霍英东同名，麦尔一举从“卖儿”的凄惨境地跃至豪门。

1995年，梅英东从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学毕业，正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因为缺少收入，他在一所中学当实习教师，同时兼职做电话接线员，在听力障碍人士与接听者之间转译传递信息。和平队的消息恰好在这个时候来。中国、蒙古、海参崴。梅英东选择了中国。

前两年的志愿服务期，梅英东被派往四川内江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教英文。晚一年来的何伟则被派往重庆涪陵，并将这段经历写成《江城》。不同于何伟，对梅英东而言，在沱江边城度过的两年时间平静、重复，没什么记录的冲动。直到他遇到北京。

梅英东1997年离开内江来到北京，一住就是10年。他在那里遇到后来的太太弗朗西斯。2010年，梅英东又在一个名为荒地的东北村庄——弗朗西斯的家乡，居住了一年。十几年的中国生活浓缩于梅英东的三部非虚构作品，《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失的老街生活》《东北游记》《中国变奏曲：一个旅行作家的中国二十年》。

前两本作品的简体中文版，分别出版于2013年和2017年，译者是他 在香港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何雨珈。梅英东给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们上选修课，讲特稿写作。课上了没多久，儿子就出生了。在此之前，在香港工作的太太怀孕，是他决定结束荒地村长居生活的主要原因。

因而这本起始于太太故乡的《东北游记》，是送给儿子的礼物。梅英东在献言中写道：献给本杰明，我们的路客。

《再会，老北京》与《东北游记》中，各有一条强烈的关于变化的主线，旧逝与新覆。虽然一个是旧朝皇城、辉煌首都，一个是中国地图东北角毫不起眼的小村庄，但本质上，两者的命运殊途同归。盛满历史和记忆的建筑与街巷以更崇高的名义被拆除，人们离开土地，住进“不接地气”的公寓——被许诺的更好生活。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和决心令梅英东震惊，他在美国见证过这种变化可能导向的未来：高速公路取代座座橘园的洛杉矶，变成工业“废城”的底特律，田野上只生长购物中心和大厦豪宅的明尼阿波利斯郊外小镇。



鲜活的历史和真实的人活跃在梅英东的笔下

梅英东刚到北京时，距离这座城市第二次申奥还有四年。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1998年，中国奥委会做出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定，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憋着一股志在必得的气势。这体现在响亮的申奥口号中——“新北京，新奥运”。梅英东赶上了如火如荼的“新北京”城市美化与翻新运动。受冲击最剧烈的，就是有数百年历史的胡同。

“一条条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人心目中的地标正在逐渐地消失。可能不久前你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这在北京已是家常便饭。”

什么人住在胡同里？他们如何工作和生活？胡同消失之后，他们到哪去了？正史只关心王侯将相，这些问题的答案，得住到胡同里去才有可能知晓。赶在巨大的白漆“拆”字化为齏粉之前。

2005年8月8日，梅英东搬进胡同。这个日期有诸多巧合。1937年的这天，日本军队自卢沟桥事变后正式攻占北平。而3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奥运会开幕。邻居老寡妇建议他和房东签个短期租约，因为“那只‘无形巨手’可能随时降临，将一切化为瓦砾场。”

记录停止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这座城市成为了“新北京”，梅老师的邻居们大多也被迫或自愿地接受了“新生活”。

两年之后，梅英东搬到东北的荒地村。除了因为这里是太太的家乡，更重要的原因是梅英东对东北作为中国近代史起落沉浮缩影的兴趣。“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这些地方竖立的牌匾上，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

《东北游记》其中一条重要的叙述线索，就是关于历史——不仅 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东亚历史、世界历史的解谜棋局。棋盘叫做“Manchuria”，满洲。

另一条线索，则是乡村与城市、农耕与商业，映照数十年中国农业社会的变迁。一家叫东福米业的公司为村民们盖起有集中供暖的公寓，说服村民将土地出租给他们进行耕种，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与“新北京”一样，“新荒地”也势不可挡。三姨种在路边，却被修路的挖掘机一次次毁掉的虞美人，就是某种隐喻。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被一心投奔“新世界”的人们快速甩下的“旧世界”，得以在文本里暂时封存。



梅英东对东北的书写萦绕在历史和现场之中

BRANDON COLLINS-GREEN 林步冉

《红楼梦》中浪漫返乡 THE BOOK OF A LIFETIME NOSTALGIA

采访·撰文：刘利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the king of the poet

Dead grass and rotten ride was a tower that touched the sky,
the coffin of the dead guy now is the bed when two lovers like

——出自清·曹雪芹《好了歌注》，林步冉 译

外国人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理由不尽相同：威尔逊为英国花园搜罗奇花异草，戴维神父想去深山里寻找未命名的珍稀动物，洛克则一门心思研究西南少数民族。21世纪来的人更多了，大多奔着这里日新月异的发展机会和丰厚报酬。却也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了读懂一本奇书来到中国，在这里找到了最纯粹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热情，并且打算一直待下去。

加拿大人林步冉 (Brandon Patrick Collins-Green) 是个80后，原本在多伦多大学读经济和会计，打算按部就班找一份看得到前途的高薪工作。2006年在新加坡的交换经历他意识到了两件事：第一，他不太喜欢会计这份工作；第二，他因为一部话剧爱上了《红楼梦》。为了读懂这本书，林步冉先后在台北、佳木斯和南昌读了汉语言的本科和国际教育硕士，又留在了江西师范大学读博。

林步冉把《红楼梦》完整读了四遍，“比毛主席还少一遍”，他说。在他看来，《红楼梦》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它的语言。“当代小说也有优秀作品，但它们的文字读起来太标准化了。《红楼梦》使用的白话文和现代汉语有区别，又不是完全不同。”另一本奇书《金瓶梅》常拿来和《红楼梦》比，甚至被很多学者认为成就更高；但他觉得《金瓶梅》还是差了一点，“《红楼梦》有现实，也有玄妙，但是《金瓶梅》只有现实，没有玄妙。”

林步冉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红楼梦>的浪漫主义精神》。林黛玉是他心中浪漫主义的代表，也是他最喜欢的人物。他认为林黛玉最纯粹。“林黛玉是有机心的，但主要是在恋爱中；宝玉也纯粹，但他没有心机；宝钗有机心，但她不纯粹。”黛玉教香菱学诗那一段提出了让他获益匪浅的艺术理论：（作诗）立意最要紧，不以词害意。若意趣真了，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这等于是直指创作的本质，同时卸下了形式的束缚；黛玉为林步冉推开了创作之门：翻译、写诗、作画一样样涌来。

他将书里的诗词、判词、灯谜等都翻译成了英语，只差宝玉悼念晴雯的那一首《芙蓉女儿诔》。他的翻译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不参考现有的版本，本来就是给自己翻译的，不用被别的译本影响；第二就是抛弃学术翻译常见的“拼音加注释”的方法，直接进行文化转译。对含义丰富的汉语名词（仅一个“袭人”恐怕要难倒多少翻译家）采用拼音加以注释的方式，确实是不得已之法，会极大地破坏阅读的美感。且不说拼音对英语读者毫无意义，不断去看注释也会打断阅读节奏。大卫·霍克斯与其女婿合力做出了目前国际上最通行的英译本，但林母告诉他，看不下去，人名太多了。这和中国读者被《百年孤独》里冗长而重复的西班牙语人名劝退如出一辙。对此，林步冉引用了一位法国作家的观点：翻译就像女人，漂亮的不忠诚，忠诚的不漂亮。因此，为了漂亮就只好牺牲一部分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举个例子，杜甫诗中提到李白，如果直译为Li Bai，对不熟悉唐诗的外国读者，就势必要解释李白是谁，所以他选择译为King of poets。

2017年，一个乌克兰同学带他去参观了八大山人纪念馆，回来他就开始画画。没找老师，“找老师可能会画得更好，但是会失去特色。”他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画，配书里有的、名家写的诗，自己也写诗，中文英文都有，中文就繁体竖排，英文就从左到右横排，一共画了大约3800幅。开始他打算把画送人，因为送才符合他心中最纯粹的定义，“但是一来我不认识那么多人，二来有时候送了别人不珍惜，我就开始卖画了。”为了便于自己装订画册，他的画作尺寸多为37*40公分。装裱是自学的，画册是自己做的。他对出版画册不感冒，因为出版物就要标准化，自己做的虽然有瑕疵，每本却是独一无二的。

林步冉的画作看起来，构图和留白还有西方人学中国画的影子，基本上是画一半、配文一半，画的那一半也是满满当当；但写意和神韵又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人”，恐怕湘云自己都想收藏那张“醉卧芍药茵”。古代中文没有标点，留给读者自行句读；英文标点怎么画都不好看，就只好全部小写，仅在每一句的开头字母用大写。

虽然这么爱黛玉，他倒不是依着黛玉而姓林。2006年他的朋友给他起了这个中文名，“林”在读音和词意上都和他的姓Collins-Green暗合。林步冉的父母别出心裁地将两人的姓结合起来给他取名，这样的平等主义在中国却让他吃了不少苦：支付宝不认可连字符，裁定他的名字和银行卡不一致，只好索性让银行把连字符也给去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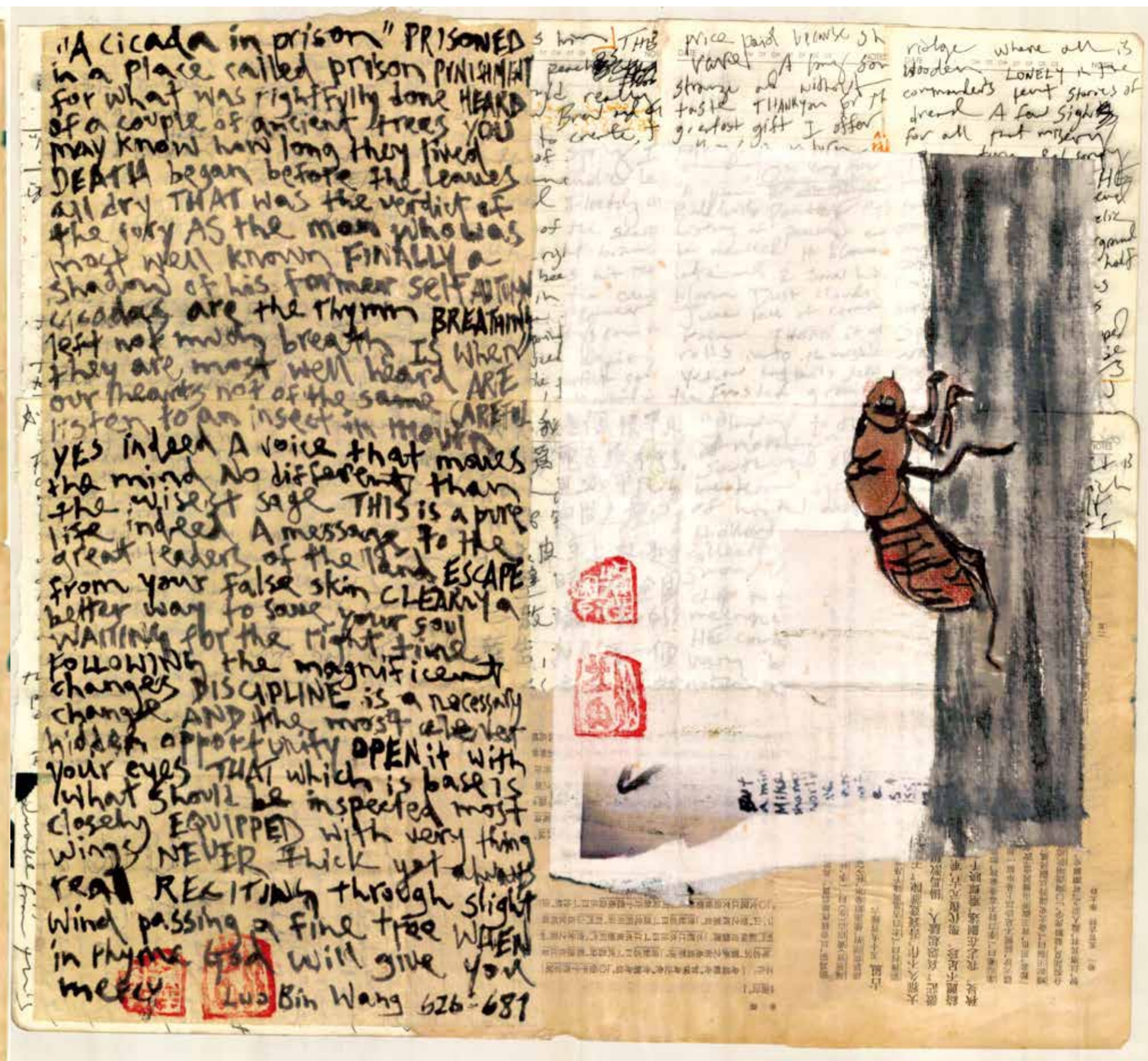
如果可以，林步冉希望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他上次回加拿大还是2018年，但是每次回去都看不到什么变化，“不像中国这么热闹”。现在中国更有家乡的感觉，当然文化差异也没彻底消失。中国人约人基本都是吃饭，但他是一个不怎么在吃饭上花心思的人，所以约人更可能是散步或者喝咖啡。另外，他生活在社交媒体大国却坚持不用智能手机，与外界联系主要靠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他觉得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太霸道，因为全世界的人看到的是同样的内容。既然智能手机带来的过量信息未必是自己需要的，为了专心创作他选择不看。

读博的五年，林步冉靠着奖学金安居在一个9平方米的居室中，基本上实现了让人羡慕的创作自由。在南昌，他干什么都走路去，走路也是产生想法最多的时候。打印机经常坏，就背着走四十分钟去修，第二天修好了再背回来。在他孤独且纯粹的日常生活里，参加画展让他得以抒发“分享欲”，提供了一种暂时而难得的反差感，因此每次参展后回到南昌都会迎来创作的爆发。

最近他开始画莎士比亚，“读完《红楼梦》再去看看莎士比亚，感受又不一样了”。靠卖画他已经能在中国生活下去，唯一的难题是签证。5年没读出博士，学生签证就很难再续发了，他如果要留在中国就要想别的办法。唯一不变的是，他还将像黛玉一样浪漫而纯粹地生活着。



林步冉的诗作《是这样》



林步冉翻译骆宾王的《在狱咏蝉》